

苏童小说论

吴雪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童



苏童小说论

吴雪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童小说论 / 吴雪丽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161-0880-2

I. ①苏… II. ①吴… III. ①苏童—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8318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路卫军
责任校对 徐婷婷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 / 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62千字
定 价 4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认识雪丽算来已近八年。八年前，她从西南一所高校到北师大来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那时候，我才知道，她其实是北方人，来自河北乡村，是一个到京城来的寻梦者。说到“寻梦”，是因为她内心有着对文学研究的一种信念，对凡俗生活之外的精神世界的一份追求。多年来她一直怀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到作为文化和学术中心之一的北京来读书。就我那三年的观察而言，她是一位执著的“梦”的践行者。

在京读博的三年，雪丽是非常勤奋的。她常常奔走于京城几所高校的课堂和图书馆之间，渴望学到更多的知识，应该说这为她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雪丽又是一个注重内心体验的人，她对文本的感受、对生活 and 生命的理解，使她一直保持了面对文本的敏锐的感受与体察的能力。

毕业后，雪丽在成都开始了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据我所知，在站期间，她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作家论的课题，尝试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重新考察文学史现象。因为专注于新的研究一时无法分心，她的这部专著拖到现在才得以面世。

这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可以说是她那些年读书、研修的一个结晶。作家作品论这类课题，作为一种传统式的文学研究，不容易突破。选取当代著名作家苏童的作品进行整体研究，是一次不小的挑战，但雪丽的研究成果是让人欣喜的。她以自己对问题视野的把握和对小说文本的细读，使这部著作不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与深化，更重要的是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发现。

苏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坛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为当代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他的小说可以说把汉语小说的叙事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文学经验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重要经验的



一部分。因此，对苏童的研究不仅是当代文学研究对某一个案的深化，同时也可以从中把握新时期小说发展的大致的脉络，并且可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某些文化症候。尽管当下有关苏童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在我看来，雪丽的这部论著依然有其独特的建树。

论著以苏童的创作为个案，从叙事视野、叙述形式、审美特质、文化诗学和哲学意蕴等方面对苏童小说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论析其艺术成就的同时，也揭示了苏童的故乡传奇、家族叙事、性别差异、寓言特质与历史、现实的复杂关系，并进而指出作家以自己的生命经验与想象方式所构建起来的小说世界和个体诗学，对于当下文学写作和文化建构的意义及其不足。

作者始终把苏童的小说放在先锋群体中予以考察。她不只注意到苏童与其他先锋作家的共性，更强调了苏童在这一群体中的独特性，以及他在先锋浪潮之后的写作中所体现出的“个体性”。比如，在其他先锋派作家摒弃故事的时候，苏童却表现出对故事的热情和对传统叙事的回归，而他小说中的古典意蕴和抒情风格也是同代先锋小说家所不具备的。作者确实把握住并描绘出了先锋潮流中的“这一个”，正是小说中那种刻意难为的才情和气质、写作姿态、价值取向和审美选择成就了苏童，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成为先锋写作中“独特的这一个”。

论著把苏童的小说写作放在整个文学史的发展中予以考察，在比较了苏童的“枫杨树乡”系列和鲁迅开启的启蒙乡土叙事、沈从文为代表的审美乡土叙事、赵树理的政治乡土叙事的不同之后，指出了苏童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之处。而“香椿树街”的市井民间叙事远离“现代性”的文学诉求，解构了对传统南方的抒情、优雅、浪漫的文学想象，丰富了文学史中的南方书写。另外又如苏童的“暴力”叙事对历史暴力合理性的游离、“历史”叙事对宏大历史的反拨、“红粉”系列对五四以来的启蒙现代性的女性书写的解构等，凡此种种，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不少耐人寻味的观点，呈现了苏童小说的复杂性。如：苏童小说的反现代的末世传奇式的“家族”叙事、建构在想象基础之上的没有原乡的“乡土”书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苏童成为少数几个构建了自己独特小说世界的作家，从“枫杨树乡”到“香椿树街”，从乡村到城市边缘，苏童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地域书写与地方志记录。“枫杨树乡”是他虚构的乡土世界，旨在完成自我的精神还乡。“香椿树街”则是他从小生长的那条苏

州城北小街的少年记忆的文学表达，同时负载了他的南方记忆和精神想象。而苏童怀着“旧时代古怪的激情”演绎的“宫廷传奇”，呈现了在历史废墟上个体的生命悲歌。以“红粉”系列为标志，苏童开拓了男性作家书写女性的新境界，游离在历史理性和启蒙理性之外的女性书写，也成为文学史上一道别致的风景。另外，作者通过叙事分析，指出苏童小说对现代叙事策略的继承与消解、对传统叙事的借鉴，和其他专注于形式实验、叙事革命的先锋作家不同，苏童呈现出一位当代文坛上在传统与现代叙事之间自由穿行的小说家成熟的风格特色。而其唯美的抒情风格是对整个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回归中的背离，其“末世的颓废”的美学特色构成了对权威美学话语的挑战。

应当说，雪丽对苏童小说的理解是相当全面的，对20世纪中国小说史也比较熟悉，这为她的比较和论析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也使其有可能概括出苏童小说独特魅力的所在。而且，从写作中可以看出，她把握了到目前为止的有关苏童的详尽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做了认真的鉴别和研究，这使她的学术思考建立在深厚的资料收集的基础上，使其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体现了她对苏童小说的熟悉程度和区别于一般性评论的思考深度。再加上雪丽在论述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文本敏锐的领悟与把握能力，流畅而富有文采的语言表达，遂使这部著作在整个苏童小说的研究领域显示出其自身的价值和重要性。

我想，今天的文学研究者，也许大多在少年时代都怀有过一份对文学的浪漫纯情，大都曾经是“文学青年”，雪丽大概也不例外。从她的行文中，常常可以读到她对苏童小说的那种忧伤的抒情、没落的个体生命悲歌的生命体验，而属于女性的那种细腻而敏锐的体验，又赋予了她的写作一种灵动的气韵。

对于雪丽那一代人来说，苏童们的小说曾经伴随了她们的少年成长，从雪丽的写作中也可以看到早年阅读经验对她的影响。但长久陷于单个作家的个案，沉湎于个人一己的好恶，视野难免促狭，批评能力也会随之钝化，这或许也是论著的一个不足。

期待她今后能够克服这方面的弱点，并有更大的进步和收获。

张健

写于北师大励耘楼，2012年4月15日

目录 Contents

序	张健 / 1
---------	--------

绪 论：穿行在时间之流中

——苏童小说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一 20世纪文学史上的苏童 / 2
- 二 先锋潮流中的“这一个” / 8
- 三 苏童小说研究与当下文学批评 / 14

第一章 在世界的两侧——苏童的小说世界

第一节 故乡传奇与老城叙事 / 22

- 一 “枫杨树乡”的传奇 / 22
- 二 “香椿树街”的旧事 / 30

第二节 历史神话与市井民间 / 37

- 一 历史激情与神话重塑 / 38
- 二 市井民间的现实书写 / 44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与人性诗学 / 52

一 “红粉”们的宿命 / 53

二 男人们的颓废 / 57

三 人性的困境 / 60

第二章 传统与现代之间——苏童小说的叙事分析

第一节 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 / 67

一 传统的叙事模式 / 68

二 古老的时空观念 / 74

三 优雅的抒情语言 / 78

第二节 现代小说的叙事策略 / 82

一 多重叙事人的设置 / 83

二 自由穿越的时间修辞 / 87

三 幽玄复杂的结构方式 / 91

第三章 末世风情中的寓言——苏童小说的审美特质

第一节 末世的颓废美学 / 99

一 神秘的审美元素 / 100

二 唯美的抒情风格 / 104

三 末世的颓废美学 / 109

第二节 匮乏时代的寓言书写 / 112

一 寓意丰富的静态意象群 / 113

二 意蕴飞扬的动态意象群 / 119

三 匮乏时代的寓言书写 / 124

第四章 行走在文化地形图中——苏童小说的文化诗学

第一节 影响的焦虑——文化影响与传达 / 131

一 对江南文化的传承与游离 / 132

二 对异域文化的借鉴与突围 / 138

第二节 雕刻的史志——文化人类学的视野 / 145

一 “江南乡村”的“民族志” / 146

二 “小城边缘”的“地方志” / 151

三 汉民族的“人性史志” / 155

第五章 废墟上的舞蹈——苏童小说的哲学意蕴

第一节 无法获救的人生——苏童的生命哲学 / 161

一 与生俱来的人性缺失 / 162

二 苦难的生命历程 / 166

三 无法获救的人生 / 170

第二节 历史断裂处的悲歌——苏童的历史哲学 / 174

一 颓废的历史末世学 / 175

二 历史的虚无主义本质 / 178

三 历史断裂处的个体命运 / 183



余 论：在困境中重新上路

——苏童与当下文学写作

一 个体写作与民间写作 / 188

二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 / 191

三 写作的困境与突破的可能 / 195

参考文献 / 198

附录（一） / 205

附录（二） / 211

附录（三） / 220

后记 / 228

绪论： 穿行在时间之流中

——苏童小说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在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中，20世纪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文学不仅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而且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和重要的文学实践。那曾经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文学和历史一起燃烧；那曾经是一个激情和梦想的时代，文学与理想一起飞翔。在这样一个不断经历着历史的断裂、整合的时代，是文学在记录着时代记忆的同时，也弥合着时代的创伤。也就是说，在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中，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不仅记载了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现代性变革，而且以自身的审美方式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艺术创新。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见证了这个时代，也不断在文学的自足性方面完善着自身。

对现代文学的合法化叙述建构了新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成为现代文学中的几座高峰，而在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重新发现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的价值。当代文学在建构其合法性的同时，也期待着新的文学经典的产生。因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叙述中，一个新的时代必然应该有全新的、更高的文学出现，这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历史叙述。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被叙述被建构的，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叙述中，其实是重新颠倒了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并借五四的精神资源重新赋予“新时期”文学以新的意义和价值。但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对当代作家的经典化一直是一个未完成的叙述。一是因为历史的切近，没有经过时间的积淀；另一方面，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叙述和研究多是一种潮流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对作者的个案研究。然而，每一阶段的潮流性的写作都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作家，以他们的创作实践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实绩。



对整个当代文学甚至对整个20世纪文学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狂飙突进的姿态登上文坛的先锋派小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先锋小说决绝的形式实验不仅对当时的主流写作构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对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有着革命性的意义。而在先锋派作家中，苏童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小说在当时的潮流性写作中能够脱颖而出，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才子型作家的才情，更重要的是他的小说在对西方资源借鉴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作为一个站在潮头的先锋作家，他所显示出的古典气韵是当时许多作家所不具备的。这种刻意难为的才情和气质、写作姿态、价值取向和审美选择成就了苏童，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而且成为先锋写作中“独特的这一个”。

从1983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第八个铜像》到2009年长篇小说《河岸》的问世，苏童的写作已经走过了近30个年头。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持续的写作提供了什么样的中国经验？在文学的“全球化”和“民族化”的议题面前，苏童的创作给予了什么样的借鉴？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苏童作为一个个案，他的写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为当下的文学写作提供了哪些可供借鉴的意义和价值？

一 20世纪文学史上的苏童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许多作家以他们的小说竖起了精神的丰碑，那些伟大的作品如同历史星空里闪亮的星星，照亮了新文学原本晦暗的天空。他们的小说往往铭刻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一种文学规范的建立或终结。而在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对文学规范的反叛和挑战，无疑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苏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他的小说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小说世界，一种新的表现题材和表达风格。而这种叙述策略不仅旨在完成自我的精神救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以感性的生命形式从历史叙述的深度中逃遁而出，确立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尊严。

“在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为？”海德格尔说：“他们如同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①那么，在当下的文学困境中，苏童的小说

① [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提供了什么？更具体地说，作家为何写作？他的写作表达了什么？他要通过写作达到什么？叙事的资源、写作的姿态、叙事的边界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呈现？他是为社会立言、为民众启蒙还是为自我写作？是以积极的心态介入生活还是以“零度情感”描述生活甚至认同生活？写作是作为一种高尚的职业还是作为一种日常的生存方式？在以儒家思想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小说的意义主要在于它的教化功能，小说成为对社会规则和伦理价值的守护和宣扬。自现代以来，启蒙和救亡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的价值取向，无论是五四时期受欧风美雨洗礼、“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现代文人，还是“十七年”高唱社会主义赞歌的当代文人，他们的写作姿态都延续了启蒙的浪漫激情和对强国之梦的乌托邦想象。新时期以来的“伤痕”、“反思”和“改革”小说的基本言说方式和叙事内容也是当时历史情景下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话语，进行的是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启蒙，他们的叙事在一定意义上为当时的社会实践进行了文学的论证。“寻根”小说则重在对民族历史与现状的追溯和探索，以达到文化启蒙的目的，“文化寻根”正是为了解决“无根”的恐慌和话语压抑的焦虑。而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形式实验”的姿态登上文坛的先锋派来说，他们的小说创作既远离了传统小说的教化功能，也远离了现代小说的启蒙立场。先锋作家们以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想象空间放逐人类的共同生存体验，远离明确的主题指向，也远离了作家的启蒙立场。

苏童作为先锋浪潮中的一员，从开始写作就表现出反启蒙的姿态，写作是个人的事件，是属于自我心灵的。“那种对小说的社会功能、对它的拯救灵魂、推进社会进步的意义的夸大，湮没和扭曲了小说的美学功能。小说并非没有这些功能和意义，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小说原始的动机，不可能承受这么大、这么高的要求。小说写作完全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存方式。对我来说，我是通过小说把我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就像音乐家通过音乐、政治家通过政治，其他人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与世界联系起来一样。”^①对苏童来说，小说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写作是他进入世界的一条通道。从《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1934年的逃亡》、《罍粟之家》的“枫杨树乡”系列，到《刺青时代》、《城北地带》、《南方的堕落》、《菩萨蛮》的“香椿树街”系列，到《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的“红粉”系列，到《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的“后宫”系列，以及此后的《蛇为什

① 苏童、林舟：《永远的寻找》，《花城》1996年第1期。

么会飞》、《碧奴》、《河岸》等长篇小说和一系列短篇小说，苏童以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和想象方式建构了独特的小说世界和个体诗学。苏童的小说无法纳入整个新文学以来的现代诉求和启蒙传统，他甚至是反现代的、反启蒙的。他的颓废的家族和乡土叙事、他笔下的市井民间的琐碎的日常生活，那些在生活中挣扎的男人和女人们，是从苏童个体的心灵想象出发的，最后到达的不是历史潜在的规定性，而是个体对生命最本真的体悟。在苏童的小说中，一种基于心灵境遇和精神想象的个体诗学在先锋作家中甚至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苏童的“枫杨树乡”系列是颓废的家族叙事，是作家的一次“精神还乡”。“枫杨树乡”是一个虚构的乡土世界，而虚构的热情使苏童对想象中的世界和人群产生了无穷的表达欲望。“虚构在成为写作技术的同时又成为血液，它为个人有限的思想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它为个人有限的视野和目光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它使文字涉及的历史同时也成为个人心灵的历史。”^①我们常常被伟大作家的作品所吸引，是因为“我们进入的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天地，世界在这里处于营造和模拟之间，亦真亦幻，人类的家园和归宿在曙色熹微之间，同样亦真亦幻。我们就是这样被牵引，就这样，一个人瞬间的独语成为别人生活的经典，一个人原本孤立无援的精神世界通过文字覆盖了成千上万个心灵，这是虚构的魅力，说到底这也是小说的魅力”。^②所以，苏童虚构的乡土也是个体心灵的乡土，“枫杨树乡”的家族追溯和想象，并不是试图还原历史的真实，而是为了实现“精神的还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家族叙事和乡土书写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现代性的启蒙传统中，家族叙事和乡土书写都被纳入了整个现代性的叙事伦理，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而且，在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家族叙事和乡土书写都和某种历史的真实密切相关。从巴金的《家》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家族叙事都是关于旧家族的分崩离析和青年一代的追求、幻灭、希望等现代性命题，是和整个历史理性和启蒙精神相趋同的。在当代文学中，家族叙事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并蕴涵了多重的文化和精神向度。张炜的《古船》、《家族》、《柏惠》，通过对“善”与“恶”的家族划分进行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叙述。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对“一个民族的秘史”的追溯，

① 苏童：《虚构的热情》，载《纸上的美女》，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② 同上书，第162页。

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对“民族文化”的反省。李锐的《旧址》是对李氏家族悲剧命运的悲悯和对冷酷的历史的诘问。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对家族的历史寻根，蕴涵了重塑民族文化精神的期望。王安忆的《伤心太平洋》、《纪实和虚构》通过对父系和母系家族神话的建构，以缓解成长过程中的迷茫和孤独，释放无根的焦虑和精神的匮乏。王安忆没有否定家族传说的意义，在家族的历史想象中她试图去寻求个体的精神救赎和对个体身份的重新认定。

如果把苏童的家族叙事放置在新文学以来的历史谱系中，可以看到苏童的家族叙事既不是从“小家”到“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启蒙叙事，也不是对民族文化之根的寻找。他虽然以对在城市里“无根的焦虑”的恐惧为家族想象的起点，但苏童并不是像王安忆一样通过对一个辉煌和美丽的家族神话的建构去寻求精神的救赎。苏童“飞越枫杨树故乡”回到“罍粟之家”，发现的是败落、颓废的家族，是“逃亡”的历史，是历史暮霭中诡秘、阴郁的气息。“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1934年的逃亡》）不仅回归的路途永远消失，而且在枫杨树的故乡，鬼魅流窜、人心浮靡，苏童在想象中的“还乡”寻觅到的是祖辈行将败落的踪迹，是枫杨树家族走出历史的凄凉的背影。苏童剥离了家族和现代史的黏合，也剥离了祖辈和自我精神匮乏的联系。他最后追溯到的是在历史边缘的喟叹和感伤。

“枫杨树乡”是颓废的乡土中国的缩影，是乡土世界走向没落和消亡的历史。《1934年的逃亡》中，乡村的饥谨、贫困、瘟疫、生殖，都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逃往城市的历史也是短暂的辉煌后更深的灾难，财富、欲望、淫荡最终吞没了乡土的逃亡者。《罍粟之家》中，乡村的乱伦、弑父、革命、性奇异地缠绕在一起，像枫杨树乡里妖淫的罍粟花地，终于要从历史的场景中消失，即使曾辉煌灿烂，最终也无法逃离灰飞烟灭的命运。苏童的乡土叙事解构和颠覆了现代以来的三种乡土书写。一种是自鲁迅、王鲁彦、蹇先艾等以来的现代启蒙传统对乡土的审视和批判。虽然他们都是从乡土中走出来，对乡土有深厚的感情，但当他们以现代知识者的目光来观照乡土的时候，乡土就在现代性的文明之外了。乡土成为蒙昧和落后、愚钝和劣根的所在，对乡土的书写隐含了他们重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期待。这个传统在新时期以来高晓声、路遥、贾平凹等的小说中得到了延续，表达了乡土中国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主体内在的焦虑。这种现代性焦虑是以“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为主题的现代乡土叙事，乡



土和农村仍然是知识者视野中的“他者”，而乡土却是“沉默的大多数”，是“贫穷和愚昧”的所在。乡土文化自身的生存伦理和生命力是缺席的，作家其实是以文学的形式弥合着现代性的内在裂痕。乡土叙事的第二种传统是废名开启、而以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为典型的审美传统，乡土世界是健康人性和和谐生活的象征。乡村是美丽的歌谣、是永远的家园，是相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净土”，可以安放疲惫的灵魂，是现代知识者回眸时的心灵栖息之地。近年来迟子建的《日落碗窑》、《雾月牛栏》、《亲亲土豆》，刘庆邦的《梅妞放羊》和铁凝的《孕妇和牛》等对乡土的诗意表达，延续了新文学中的这一审美传统，凸现的是乡土生存中的温情和浪漫。第三种是40年代赵树理开启的解放区传统，乡土作为一种叙事资源成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演绎和合法性证明。这种政治化的乡土叙事因历史机缘与政治文化语境而具有了民粹主义的倾向，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中成为乡土书写的主流，规范和整合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方向。但从周立波、柳青及至“文革”中的浩然，这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紧密结合的写作，终于在不断变化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渐趋衰落。总之，不管是哪一种乡土叙事，都是作家对乡土的一种想象性表达。也许真实的乡土永远在文学之外，在最为沉默而失语的乡土自身。而苏童为20世纪文学史又提供了第四种不同的乡土叙事。他的乡土是颓废和没落的乡土，这既不是现代性的理性审视，也不是审美的表达。苏童书写的是乡土的宿命，是乡土中国颓废、迷乱的传奇，是在诡谲和氤氲的潮湿雾气中走向终结的乡土，是启蒙现代性和审美视野之外“兀自的传奇”，在“历史”之外，在“叙述”之外。在苏童的小说中，古已有之的乡土，神秘地呈现并逐渐走向死亡，沉默的人们带着慵懒而迷惘的表情走向末路。

“香椿树街”系列是对市井民间的书写，苏童远离了宏大叙事而还原了日常叙事的琐碎和芜杂。“市井”不仅提供了关于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庸常人生及生存状态，而且苏童不是以知识者的姿态审视民间，而是作为市井民间生活的平视者，还原了市井生活琐碎的日常景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写作开启了对乡土中国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的命运、思想的书写，通过对北京市井民间生活的描绘，寄寓了他对民族文化和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对市井俗文化冷静的审视，有忧虑也有眷恋。他笔下的市民世界和世俗品位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老舍的市民书写因此也成为“京味文学”和“京味文化”的典型代表。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是上海市民书写的一个高



峰，她多以大都市里的男男女女百孔千疮的情感和人生经历为切入点，透视种种人生的苍凉和生命的不彻底。她总是在旧式和新式的家庭中、在市民生活的窗口，窥视上海这个大都市中市井民间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欢、人性的脆弱与暗淡。而在当下的文学视野中，对城市市井民间生活的书写自成体系的应该非王安忆莫属了，从《长恨歌》到《富萍》，“从‘淮海路’到‘梅家桥’”，王安忆写尽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浮华根底里市井民间的生活图景。从王琦瑶这个市井女子一生的民间传奇，到富萍最后落脚的苏州河边的平民日常生活中琐碎的温暖，王安忆的民间书写总是透着一份温爱和宽容，一份对都市中普通生活的洞察和体恤。

但苏童的市井民间书写，他所构建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却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市井民间的书写之外。他以“复仇的姿态”回视自己少年时代生活过的苏州城北的那条小街，破败、荒凉、肮脏、沉滞的城镇生活，狭窄而晦暗的街道，堕落而委靡的人心。苏童的市井民间是真正的“藏污纳垢”的民间，他不批判，也不眷恋。他像一个超然物外的观望者，聚焦市井民间最日常、无意义的生活本身。苏童着眼于成人们的堕落和少年们的暴力，构建了一个充满了血腥、暴力的“城北地带”，一个弥散着腐朽、堕落、淫荡的气息的“香椿树街”。需要指出的是，苏童的“香椿街”系列中“文革”后期的少年叙事，在一个侧面丰富了“文革”的文学记忆。在新时期的“文革”叙事中，承载了太多的意识形态意义，“文革”书写也成为—个荒谬时代的苦痛记忆。但苏童的意义在于他恢复了少年视野中的“文革”岁月，在这些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少年那里，“文革”成了他们自由的少年时光，虽然有荒芜的心灵和无常的暴力，但也有纯净的梦想和自由。而对“香椿树街”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述，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城市边缘书写，一种晦暗、芜杂的市井记录，解构了传统文学对南方城镇妩媚、秀丽、典雅、温情的文学想象。

总之，从“枫杨树乡”的乡土生存到“香椿树街”的市井民间，苏童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地域书写与地方志记录。他建构的“枫杨树乡”、“香椿树街”，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家族叙事、乡土书写和对市井民间的文学想象，并体现出不同的审美旨趣。更为重要的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苏童是少数几个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小说世界的作家。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的“鲁镇”系列、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师陀的“果园城”系列等，都已成为文学史的经典。他们或是表现老中国的沉滞，进行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或是书写乡土